

浅析宏观经济指标对量化选股策略的影响机制

■ 徐圣淇

宏观经济指数作为反映我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和运行状况的核心变量,通过影响企业基本面、市场流动性、投资者预期等多重渠道,深刻作用于股票市场的定价逻辑。目前在金融市场中,基于系统分析、规则分析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量化方法选择股票的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对这些宏观指标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把握股市趋势,从而达到最优投资组合、提升投资绩效的目的。

一、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及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体量扩张速度的黄金指标,其动态变化通过双重路径深刻影响资产定价。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上行本质映射社会总需求扩张,直接推升企业销售收入与产能利用率。当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持续高于长期趋势线时,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弹性显著释放。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背后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步提升。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那么人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同时他们的购买力也会提高,这样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反之,若 GDP 增速放缓,经济将放缓,或面临经济衰退,对股票价格构成下行压力。

2.通货膨胀率
人们通常借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来衡量通货膨胀率。在适度的通胀环境中,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像那些有定价权的消费品企业,通胀时合理提价就能维持甚至提高盈利能力,对股价形成支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构成的通胀双轨体系在量化策略中远非简单风险指标,其通过“成本-定价”博弈、政策预期折现和消费结构迁移三重路径驱动股票市场

分层演化。当通货膨胀率攀升至较高水平时,央行或许会采用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货币政策,这就使得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并且利润空间被压缩。高通胀还会降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抑制消费需求,企业销售业绩也受到影响,这些因素一旦作用起来,股市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3.利率
利率作为资金成本的反映,其变动通过重塑资本成本锚、资产比价坐标和现金流折现范式三重机制驱动股票重定价,其影响远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期限结构与行业异质性特征。利率下降时,企业融资成本随之降低而投资意愿变强,盈利预期也跟着提升;同时,储蓄吸引力下降使资金从银行等储蓄渠道流向股市,这增加了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从而推动股价上涨。像房地产、公用事业等这类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对利率变化比较敏感。当利率下降时,这些行业企业的偿债压力减轻且新项目投资可行性提高,因此股票价格往往能有不错的表现。反之,利率上升会使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并提升固定收益资产的相对吸引力,导致股票市场资金外流和估值下调。

二、宏观经济指标在量化选股策略中的作用机制

1.宏观经济指标与多因子模型
在量化选股中,多因子模型是应用最广泛的模型之一。宏观经济指标可作为关键的风险因子或风格因子纳入模型,如把 GDP 增长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前景的因子。当经济增长较快时,钢铁、煤炭等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的周期类股票,在模型中的因子暴露值或预期收益率贡献较高,进而增加其在投资组合中的配置

权重。此外,通货膨胀率可作为影响企业成本和定价能力的因子,高通胀环境下,成本转嫁能力强且有定价权的企业表现更优,在模型中获得的权重会更高。利率因子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资金密集型行业受利率影响显著,将利率指标纳入模型,有助于识别并筛选不同利率环境下的优势企业股票。

2.宏观经济指标与风格轮动模型
风格轮动模型旨在捕捉市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风格股票(如价值股、成长股、小盘股、大盘股等)的偏好变化情况,宏观经济环境是推动风格轮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经济复苏与扩张刚开始的时候,市场的风险偏好慢慢提高,成长股通常更受欢迎。这是因为经济增长预期良好,成长型企业增长潜力高,盈利增速或许会更快,股票价格上升的空间也大。这时量化选股策略能够依据 GDP 增长率、PMI(采购经理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判定经济处于什么阶段,提升成长股风格因子的权重,重点配置高成长性股票。而当经济有下行压力时,市场就更偏向于防御性的价值股。把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放进风格轮动模型,就能更精确地把握住市场风格切换的时机并使选股策略得到优化。

3.宏观经济指标与行业轮动模型
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在量化实践中面临周期边界模糊与行业响应滞后的困境,而宏观经济指标是行业轮动模型的重要依据。例如,经济复苏期 PMI、货币供应量等先行指标回升,建筑、建材等基建行业率先受益;经济增长期消费品行业(如食品、饮料、家电)逐步复苏;经济过热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利好资源行业;经济衰退期公共事业、医药等防御性行业表现更稳定。通过追踪 GDP 增长率、利率、PPI 等指标

判断经济周期,可提前布局潜在上涨板块,规避下行板块以获取超额收益。

三、基于宏观经济指标的量化选股策略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与处理
选取过去十年的 GDP 增长率、CPI、利率、城镇调查等宏观经济数据,以及同期 A 股市场的股票价格、财务指标、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等数据。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影响,同时清洗股票数据,剔除异常值和退市股票。在实际操作中,数据的清洗和处理是一项复杂且关键的工作。例如,对于一些缺失的宏观经济数据,需要采用合适的插值方法进行补充,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2.模型构建与策略实施
构建一个包含宏观经济指标因子的多因子量化选股模型。将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因子之一,与传统的财务因子(如市盈率、市净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市场因子(如成交量、换手率等)相结合。通过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构建股票综合评分体系。根据评分高低选取一定数量的股票构建投资组合,定期(如每月或每季度)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以适应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在模型构建过程中,不同因子权重的确定需要反复测试和优化。

3.策略绩效评估
本项目以基于宏观指标的量化投资策略为研究对象,以年收益率、夏普比、最大回撤为指标,并与仅包含财务、市场因子的模型对比显示:纳入宏观指标后,量化选股策略的平均收益率提升 1.1%,夏普比率提升 0.4%,最大回撤降低 3.2%,表明正确使用宏观指标能够改

善股市表现,提升风险收益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宏观指标对策略绩效的提升效果有所不同。例如,在经济波动较大的年份,宏观指标的引入对策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宏观经济指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很大,其影响机制也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 GDP 增长率、通胀率、利率等,不仅可以反映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还可以作为多因子模型、风格轮动模型、行业轮动模型等量化投资策略的输入变量。实证研究表明,在量化筛选个股过程中引入宏观经济指数,能够提高企业的策略绩效,提高企业总体收益,增强企业风险管理水平。

2.投资建议
投资者运用量化选股策略时,需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指标的分析与运用工作,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数据发布的状况并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给股票市场带来的影响。在宏观经济环境面前,要调整量化选股模型里的参数以及因子权重,并且及时优化自己的投资组合。例如,经济扩张时就增加跟经济周期有关的因子权重且重点配置成长股和周期股;经济衰退时则提高防御性因子权重且重点配置价值股和防御性行业的股票。同时,要结合多种分析方法与风险管理工具,持续优化策略以适应复杂市场。此外,还可以建立宏观经济指标预警机制,当某些关键指标出现异常变化时,及时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以降低投资风险。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

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服务管理优化策略

■ 牛箫晴

在普惠金融框架下,农村金融服务管理优化是推动乡村振兴与金融公平的关键路径。当前,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从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布局、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强化农村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以及深化数字技术在农村金融中的应用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优化策略,旨在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可持续性 & 包容性,为缩小城乡金融差距提供实践参考。

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布局
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服务效率的核心因素,要推动物理网点与数字平台双轨并进,构建多层次服务网络。物理网点建设应聚焦偏远地区,通过政策激励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如对设立县域分支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同时,推动流动金融服务车助农取款点等轻量化服务模式,弥补固定网点覆盖不足。数字平台方面要加快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整合农户资产经营及信用数据打破信息孤岛。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
传统金融产品和农村需求错配是服务低效的主要原因,要针对农业周期长风险高抵押物匮乏的特点开发差异化产品。例如,推广“保险+期货”模式,用价格保险对冲农产品市场风险,降低农户违约概率,同时探索活体畜禽农机具等新型抵押品,结合区块链技术实现抵押物确权与流转。在服务模式创新上可引入“金融+产业链”模式,围绕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环节提供全链条融资支持,如为农业合作社提供订单融资,将核心企业信用延伸至上下游农户。此外,应发展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生态农业农村清洁能源等项目,促进经济与生态效益协同。

强化农村金融风险防控机制
农村金融的高风险性要求构建多层次风险防控体系。政府层面需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政策性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保费补贴比例,降低农户参保成本。金融机构应建立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将气象数据、市场价格等外部变量纳入风险预警系统,实现风险早识别、早干预。同时,可引入第三方担保机构,通过“政府+银行+担保”模式分散风险。例如,设立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基金,为县域金融机构提供风险补偿。此外,需加强农户金融素养教育,通过田间课堂、线上课程等形式普及信用知识,减少道德风险与操作风险。

深化数字技术在农村金融中的应用
数字技术是破解农村金融“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需加快 5G、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在农村的布局,降低数字鸿沟。金融机构应开发适配农村场景的移动金融 App,集成贷款申请、还款、保险理赔等功能,简化操作流程。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农户消费、社交等行为数据,构建替代性信用评分模型,为无征信记录农户提供融资机会。从普惠金融视角来看,农村金融服务管理优化是系统性工程,要依靠基础设施完善、产品创新、风险防控和数字赋能协同推进,以此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金融差距。四个方面相互支撑、彼此配合,共同构建覆盖广泛且功能完备、风险可控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

(作者单位: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浅谈新建矿山企业基建期到运营期的会计处理问题

■ 王志刚

在 ESG 国际标准落地的背景下,新建矿山企业面临资产分类复杂化、成本核算精细化与环境责任显性化的多重挑战。在现行会计处理中,资产确认边界模糊、成本归集逻辑粗放等问题,难以适配矿山基建期资本密集、运营期资源消耗动态变化的行业特性。从基建期资产初始确认与分类计量、基建成本归集与资本化管理及融资成本会计处理优化,结合运营期资产价值转移与损耗核算、生产成本核算与分摊策略、收益确认与责任成本计量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构建契合矿山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会计框架,为行业政策落地与企业实务操作提供理论支撑。

一、基建期会计处理关键领域
(一)资产初始确认与分类计量
新建矿山企业基建期资产确认需严格遵循会计准则,明确区分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采矿权作为核心无形资产,应依据勘探阶段成果及法律权属文件确认,按取得成本计量并合理摊销。例如,某大型新建金矿企业在确认采矿权时,不仅需要结合地质勘探报告中探明的黄金储量,还应依据采矿许可证的审批进度,只有在权属完全明确后才予以确认,防止提前入账带来的计量风险。施工设备、运输工具等固定资产需结合使用用途与经济寿命,采用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分类计量时,需辨析临时设施与永久工程的会计属性,前者按周转材料摊销,后者纳入固定

资产管理,确保资产价值反映实际经济利益流入。

(二)基建成本归集与资本化管理
基建成本归集需建立清晰的核算体系,将直接材料、人工薪酬、机械台班费等直接成本计入在建工程,间接费用按合理标准分摊至各成本对象。资本化管理重点在于判断支出是否符合资产定义,如矿井巷道建设、选矿设备安装等形成长期经济利益的支出,应通过“在建工程”归集并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需注意土地复垦费、安全生产费等专项支出的资本化条件,依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分期计入成本,避免混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界限。例如,某新建矿山企业将前期一次性缴纳的土地复垦保证金,按预计矿山服务年限分期摊销,而非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更符合配比原则。

(三)融资成本会计处理优化
矿山基建期融资成本需区分资本化期间与费用化期间,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的银行贷款利息、债券融资费用,应按实际利率法分摊计入在建工程成本。对于多项目融资的情况,需采用合理方法分配资金成本,避免简单平均分摊导致的计量偏差。同时,关注闲置资金收益对融资成本的抵减效应,将暂时闲置的专项借款利息收入冲减资本化金额,确保融资成本计量符合配比原则,真实反映基建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

二、运营期会计处理核心体系
(一)资产价值转移与损耗核算
运营期资产价值转移需精准匹配资源开采节奏。固定资产折旧需结合设备实际负荷调整。例如,露天矿运输卡车按作业里程计提折旧,地下开采设备依台班时长分摊损耗,避免统一年限法导致的价值偏离。采矿权等无形资产摊销应衔接地质储量动态变化,采用产量法按实际开采量分摊初始成本,同步计提矿山闭坑后的环境恢复准备,将资产损耗与资源开发进度直接关联。设备改良支出需判断是否提升产能或延长寿命,符合条件的计入资产原值,否则作为当期费用,确保价值转移反映资产实际服务能力变化。

(二)生产成本核算与分摊策略
生产成本核算需构建分层级的成本归集框架。直接成本中,矿石剥离费、选矿药剂费按矿种别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爆破器材消耗依开采设计方案分摊至各作业面。间接费用采用作业成本法,将通风排水电费、设备维修费按采矿、破碎、筛分等作业环节的资源动因分配,改变传统按产量平均分摊的粗放模式。辅助生产部门费用通过交互分配法在采矿、选矿车间间精准分摊,避免单一标准导致的成本扭曲。期末在产品与产成品成本划分需结合矿石加工流程,按完工程度计算约当产量,确保成本计量符合生产工艺实际。

(三)收益确认与责任成本计量

收益确认需严格遵循商品控制权转移时点,矿石销售按交货方式区分:铁路运输以车板交货确认收入,公路运输以交货买方指定地点为依据,避免提前或滞后确认。责任成本计量需建立三级责任中心:采矿工段作为成本中心,考核掘进成本与矿石回采率;选矿车间作为利润中心,管控加工成本与精矿品位;销售部门作为收入中心,追踪货款回收与客户信用。各责任单元成本边界需清晰界定,辅助材料消耗按定额标准考核,动力费用按装机功率与作业时长分摊,通过内部转移价格体系平衡各环节利益,形成全员成本控制责任网络。

综上所述,围绕新建矿山企业不同阶段的会计处理核心问题,从基建期资产初始确认与分类计量、基建成本归集与资本化管理及融资成本会计处理优化到运营期资产价值转移与损耗核算、生产成本核算与分摊策略、收益确认与责任成本计量,形成全流程会计处理框架。而通过明确采矿权摊销与设备折旧的资源匹配机制,优化间接费用分摊方法并细化收益确认标准,为解决矿山行业特殊会计核算难题提供了可操作路径。随着数字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并在矿山领域普及,企业可实现成本实时归集与动态核算,推动行业财务管控模式向智能化转型。

(作者单位: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认同

■ 王许诺

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下,局部冲突和对抗对峙仍然时有发生,“零和博弈”思维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下行,各国优先保障本国利益,国家间沟通不畅、相互警惕提防造成了资源内耗和浪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的中国方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务实推进,旨在整合全球资源、减少国际内耗,促进各国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新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联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思想依据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各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分工使世界各国形成紧密的命运关联。即使存在摩擦,面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化解冲突、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各国共同发展的明智之举、必然选择。然而,世界各国人民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认同,想要构建共同体,必然要找到各国利益诉求的交会点,确定各国人价值理念的异中之同,而这个共同点就是“共同价值”。

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因长期服务于特定国家利益,奉行“零和博弈”的对外策略,逐渐异化为霸权国家排除异己、为己谋利的工

具,进而失去了普世的意蕴,丧失了价值引领功能。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革新的背景下,“共同价值”理念引领的缺位催生了对新型国际合作理念的迫切需求。中国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打破国家边界局限,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一致性,谋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思想依据。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念的传播需要物质实践的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认同,依赖于其为世界各国带来的切实利益与发展机遇。只有通过具体实践让各国人民感受到生活改善,才能真正增强对这一理念的认同感,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体的核心,在于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进全人类福祉。“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方案。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推动理念从愿景走向现实。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认同的实践路径

(一)深化贸易合作与强化风险防范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经济环境,首先要坚持多边主义,深化贸易合作与强化风险防范。一方面,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协商,完善多边与双边合作机制,降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合作与市场多元化;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贸易合作成本,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境外投资风险评估,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及时了解和掌握可能影响项目实施和企业运营的风险因素,为决策提供依据。其次,要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流,共享风险防范经验和信息,维护境外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地缘政治沟通与合作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核心在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博弈思维。首先,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坚持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项目。通过增进互信、减少误解,消除部分国家对地缘政治干涉的顾虑,提升国际合作参与度。其次,积极推动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将传统地缘政治中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合作共赢”。通过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平台,为沿线国家提供政策沟通、经验交流的渠道,化解地缘政治矛盾,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的政治环

境。

(三)强化利益协调与共享,增进国际合作认同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认同,归根结底是对其背后共同价值理念的认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首先,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明确各方的权益和收益分配方式,按投资比例分享收益;同时,加强对东道国员工的技能培训,提升当地自主发展能力。其次,加强公共服务领域合作,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项目,提高共建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各国人民切实感受到合作带来的实惠,增强对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感。再次,推动包容性发展,关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差距和弱势群体利益,加大对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支持力度,帮助其提升发展能力,缩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距。最后,要通过加强合作成果宣传,提升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度与认同感。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辅相成,通过深化国际合作、破解发展困局、强化利益协调与共享,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认同,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

(作者单位:齐鲁工业大学)